

绪 编

第一章 中国古代应用语言学 研究(~ 1894)

第一节 关于中国古代语言学

长期以来，中国 19 世纪末以前的语言研究一直被称为“小学”或传统语文学。“小学”的意义在古人那里不断变化，比较有影响的看法认为小学是“文字之学”，而且总是把“小学”放在“经部”之中。因此，后人就产生了两种不怎么正确的看法：一是 19 世纪末以前，中国没有语言学；二是“小学”是“经学”的附庸，古代的语言学不能算是独立的学科，充其量只能算作“传统语文学”。语文学和语言学仅一字之差，但在意义上已相去甚远。在多数人看来，语文学以文字或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注重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研究上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目的是为读经解经服务。语言学则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独立学科，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和科学。由于这种名称上的不同和认识上的差异，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语言学，或者中国古代是没有语言学这个说法呢还是没有语言学，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我们在这里讨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因为它涉及对中国语言学的整体评价，也涉及对中国古代语言学研究情况的评价和术语的使用。王宁对这个问题有中肯的意见，她认为：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语言学？首先应当说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是很有成绩的。它虽然确实是从文献的阅读、注

释、考证和语言材料的汇集、编纂开始的，而且很长时期停留在这些应用性的工作上，但它从一开始并非只限应用，而是不断地在应用中产生颇有实效的科学方法和解释原理的研究课题，只是缺乏系统的、专门的论述之作，理论被淹没在材料里，不容易一下子就被捕捉到而已。对于这一部分已经应用过的方法和既经解释过的原理，既然面对的对象是语言，便很难说它们不是语言学的内容。那么，那些仅仅是应用性的工作的本身是不是语言学呢？我想，诸如释义、标音、纂集、勘误等应用性的工作本身，的确够不上是语言学，但它们既然是产生古代语言学课题的渊藪，便不能不作为中国语言学的一种萌芽，在应用和理论难得绝然划清界限的年代，语文工作和语言研究本来就凝聚在一起，像水乳之不可分离，硬去离异它们，就不免会钻牛角尖（《语言学史与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 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 325 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中国古代有语言学。不仅有，而且还相当发达。中国古代语言学有许多门类，有许多重要著作，有许多语言学家。语言学家不只研究语言，这不见得就不算语言学家。我们现在缺的是跨学科的语言学家。再说，我国几千年来的语言生活有了很大发展，出了那么多语言使用那么美的作家作品，那是自然产生的吗？我们正是要探讨里面的科学性。孔子有语言观，孟子有语言观，庄子、韩愈、柳宗元有语言观。不专谈理论，一方面反映了我们的理论水平可能不很高，一方面可能是限于传统和习惯。我们古人谈理论是从应用中来又到应用中去，并没有想着为别人将来捕捉起来方便，没想到以后别人捕捉起来不方便会说你没有什么理论。中国古代语言学如此，中国古代医学等也是如此。中国古代语言学重视应用，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是应该发扬的传统。问题是要提高应用研究的水平，

而不是脱离、贬低应用和应用研究。中国古代有没有语言学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说明到了近代以后，我们有的语言学和语言研究有贬低应用的倾向，虽然他们很多人不能脱离社会的需要做应用研究，但是并不当作多大学问，有时候是兼顾着的。贬低古代，贬低国学，贬低应用，跟大的思潮的偏差和思想方法的简单化有关。认为 19 世纪末以前中国没有语言学，主要是受到外国的影响。我们也有必要把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的术语和内容同外国语言学、语文学的术语和内容作个比较。王宁在同一篇文章里说：

欧洲的语言学家先是把以古代文学作品和书面文献的语言材料为对象而进行的历史语言分析称作语文学，以后又把语言学在文学和文化上的应用称作语文学。中国的“小学”在研究文献语言的历史状况方面很像前者，而在语言的综合应用方面又类后者，从比较的角度看，把它称作语文学，或者相当于欧洲的语文学，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把它放到中国语言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源流中去，就让人感到很别扭，有点对不上榫头。中国古代的“小学”不但能覆盖后面的文字、音韵、训诂，而且还覆盖以后的虚词、句式等语法课题，它生发出修辞学、风格学、文章学的研究，还为辞书编纂和后代的文献学诸科目——版本、目录、校勘、辨伪等提供了资料和经验，它的实际状况是既不同于欧洲所称的第一种语文学，又有别于欧洲所称的第二种语文学的，把它作为中国语言学的发端，只是指其中与后来的语言科学有源流关系的那一部分关系而已。（326 页）

这个意见是对的。没有语言学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就没有语言学，使用术语，只要不出太大问题就行了。相对“语文学”“小学”，可以叫语言学，相对“传统的语言学”，可以叫“现代语言学”，但是“现代语言学”一说又要避免跟索绪尔开创的学说搅起

来。冷静地认识、吸取中国古代的精华，借鉴外国合理的成分，使本体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学理论高层次的结合，才更需要后人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

第二节 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分期及其主要成就

中国古代语言学主要有文字、训诂和音韵三个门类，文字偏重字形研究，训诂偏重语义研究，音韵偏重语音研究。三个门类不是同时产生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发展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并不割裂，而是紧密结合，共同为读经解经服务，为解决语言的实际问题服务。中国古代语言学是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结合在一起的。语言学又和哲学、文学、佛学、经学等相关学科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里介绍中国古代应用语言学研究，把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放在一起，也重视语言和相关学科的关系。关于中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何九盈先生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有比较详细、深入的研究，本书从何著引述颇多。

关于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分期，何著说：

先秦时代以研究事物名称为特色；两汉以研究文字、词汇为特色；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是词义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阶段；隋唐宋是汉语语音研究趋向稳固、统一的阶段，在文字学、语义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元明时代的语音研究以面向实际为主要特色；清代以研究古音古义为根本特色，这是古代语言学进行大总结的时期。（前言，7页）

一、先秦的语言研究（~公元前3世纪）

先秦时期（包括秦王朝），没有专门的语言研究，也没有专门

的语言学家。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如孔子、老子、墨子、公孙龙等，甚至中央王朝在关心其他实际问题的时候也关心了语言问题。语言学知识在实际的应用中有了萌芽。

先秦的语言萌芽主要有方言调查、词义辨析、修辞理论、名物训诂、蒙童识字、语言理论等六个方面。（参见何著 1~3 页）

方言调查和中央王朝的政治需要有密切关系。周秦时代，中央王朝为了“不出牖户而知天下”，专门设立到各地调查采集方言的官员。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十说：“此使（即调查方言的官员）考八方之俗雅，通九州之异同，主海内之音韵，使人主居高堂知天下之风俗也。”（参见何著 44 页）扬雄给刘歆的信和应劭的《风俗通义·序》里也都谈到：周秦时代的每年八月，中央王朝都派出使者到各地调查采集方言，回来加以编纂。这些调查材料“皆藏于周秦之室”。

先秦典籍中的词义辨析，有的是借助字义字形的解释来阐明哲理或政治主张。比如《论语·颜渊》叙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政就是正，您带头端正自己，谁敢不端正呢）？”又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叙述的“邲之战”，楚国打了胜仗，潘党劝楚庄王建筑军营，积尸封土，来显耀自己的武功。楚庄王不肯。在楚庄王的长篇谈话中特别提到“武”字的字形是从“止”从“戈”，只有停止干戈才能够称得上为“武”。有的是为了解释古书字义。如《孟子·梁惠王下》说到齐景公命令太师作君臣相悦的乐章，名为《徵招》《角招》，其中有一句话是“畜君何尤”。孟子怕齐宣王不懂什么叫做“畜君”，所以他解释说“畜君者，好君也”。“好君”等于说“悦君”，也就是君臣相悦。全句的意思是“臣子使君王欢乐有什么罪过呢？”有的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说明词的真正意义。如《易·说卦》说：“乾，健也；坤，顺也；坎，陷也；离，丽也；兑，说也。”

修辞理论的探讨和春秋战国时期个人著书立说的风气大开、诸

侯国之间交往频繁有直接关系。那时候，因著书的需要和交往的需要，怎样运用语言成为社会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对此，孔子有过一些好的思想，如“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矣”“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等。这些修辞原则，到现在还有积极意义。这是顺应了语言规律的结果。

名物训诂和阅读古文献有关。像《诗》《书》《易》《礼》等文献，有的部分非常古老，不经过训释，很难读懂。春秋以后，教书先生对古代典籍的字义进行训释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战国后期已经出现了注解古籍的专著。如《墨子》的《经说》是解《经》的，《韩非子》的《解老》《喻老》是说解《老子》的。更值得关注的是，先秦时代，已经有了名物训诂的专著《尔雅》。《尔雅》的编纂目的主要有两个：正名命物和解经。客观上，它也保留了天文、历法、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也成为我国研究汉语词义演变史的重要著作。《尔雅》体例划一，结构完整，首创按词义类别编排词汇的体例，对后代辞书编纂产生重要影响，有人把它看作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词典。

童蒙识字起于周朝和秦朝文字统一的需要。文字统一的目的是维护统治。周王朝统一文字，推广“雅言”的活动每隔若干年就要进行。为了适应这项活动，宣王时代的大史官籀编著了儿童识字课本《史籀篇》，它对当时的“书同文”起过重要作用。《礼记·中庸》也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转引自何著 38 页）“今天下”指的就是周王朝。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维护统一，改变以前“天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语言文字方面的重大措施就是“书同文”。秦朝的“书同文”工作由李斯负责。李斯编写了儿童识字课本《仓颉篇》，另外赵高编写了《爰历篇》，胡毋敬编写了《博学篇》。这三部童蒙识字课本到了汉代合称《仓颉篇》，又称“三仓”。“三仓”对后代的汉字研究和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童蒙

识字、文字统一在客观上对民族的统一和社会的统一有积极意义。积极的意义和消极的意义常常搅拌在一起，“书同文”的消极影响使后代的文字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它展开的。

先秦时期，语言研究成绩最突出的是语言理论。说到先秦的语言理论，不应该忘记先秦的思想家、哲学家，或者说先秦的哲学家很多也是语言学家。他们在思考许多其他宏观问题，如人类自身、社会存在、政治伦理和逻辑思维等问题的过程中，也思考了语言问题。这跟古希腊的情形很相似。先秦时代语言理论的产生，也是由“名实之争”推动的。

名实之争发端于孔子。孔子从政治的角度提出“正名”的主张，它的政治涵义是以周礼为尺度来正名分，以维护周朝的正统统治。“名实之争”反映在哲学上是世界本原的问题，反映在语言学上就是词语和客观事物的关系。概括起来，“名实”之中涉及到的语言问题主要有语言和社会存在，也就是“名和实”的关系问题；语言和政治伦理，主要是要不要正名的问题；语言和逻辑思维，主要涉及词和概念、辞和意、辩说和论据等问题。当时的老子、墨子、公孙龙等都参加了名实之争，有的还提出了比较科学、比较系统的看法。如老子的《道德经》上说：“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比较科学地说明了“名”的产生。墨子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子·经说上》）”意思是说，“名”是用来作称呼的，“实”是所称呼的事物。同时，墨家也认识到“实”是第一性的，“名”是第二性的，并强调“名”“实”要一致，墨子说：“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墨子·经说下》）名实耦，合也。（《墨子·经说上》）”战国后期的名家代表尹文和公孙龙发展了墨家的看法。尹文认为“形”和“名”不是一回事，各自具有独立性。因此，二者会有矛盾。对于矛盾的克服，公孙龙在《名实论》中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

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意思是说：名称，是对客观事物的一种称谓。客观事物是发展的，语言也不能一成不变。当这个名称已经不是指这个东西或那个名称已经不是那个东西的时候，就不要这样或那样称呼了。（参见何著5页）

关于正名，儒家和墨家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前面已经说过，儒家提倡的正名是要维护周朝的正统统治。墨家也讲正名，他们所说的正名“是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要求说话的人准确地使用词语（转引自何著8页）。“正名”的论争不仅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它对以后两千多年的语言研究的影响也极其深远，这种影响到现在也还存在。

在对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认识上，贡献最大的首推墨子。墨子已经认识到词和概念并不等同，他认为词和概念的关系是“以名举实”。对辞和意的关系，墨子认为是“以辞抒意”，“以辞抒意”要通过人体的器官耳、口、心等。在辩说和论据的关系上，墨子认为要“以说出故”，老子也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庄子则说：“大辩不言。”

先秦时期这些关于语言的比较科学的论述，是闪现着哲学光辉的论述，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中的精华。可以说，在全部的中国古代语言学的发展过程中，像先秦这样集中、科学地论述语言理论的情况并不多见。因此，搞语言研究的人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先秦时期中国产生了那么科学、那么集中的语言理论？

许嘉璐在《语言哲学对话·序》中有过比较中肯的看法。他说：

在中国的语言学史上，也曾闪过哲理的光辉，可惜大多短暂。先秦时代，孔、孟、荀等人有关语言的论述即带有很丰富的哲学意味，老、庄在语言的运用中时时折射出对语言深层思考的机智，而墨子则把语言、词义和逻辑紧紧联结起来，其纯理性思维的高度甚至令今人叹服。

从汉代起，这一方面似乎就日见其不行了。南北朝时期虽然玄学发达，但却很少把哲学的头脑用在语言分析上；逮及唐、宋，有不少经学家是兼通哲学的，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在自己的学问中把二者沟通起来。在我看来，自秦而后使“小学”和哲学彼此渗透，因而相得益彰者太少了；……（《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

长期以来，缺乏语言学和哲学的彼此渗透，这是中国语言学难以产生有系统的语言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先秦时期的语言研究是和哲学混同在一起的。混同的原因一是事物开始时候本来就是混沌的，分不清楚。二是即使有了分离，也不会分离得那么干净，彼此之间往往还存在着亦此亦彼的联系和渗透。我们这个世纪之交，关于语言和哲学的重新结合的观点，已经得到大多数语言学家的认同，并引起语言学家的充分重视。1997年4月21日，国家语委语用所于根元、郭龙生和湖南师范大学储泽祥、吴启主、秦旭卿、彭润泽等共同开展了题目为“中国古代语言哲学”的讨论。讨论从哲学的高度看待语言，与会学者就“古代语言哲学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它们的评价”“古代语言哲学的表述特点”“古代语言哲学同外国语言哲学、现代语言哲学的关系”等几个方面展开了讨论。讨论中比较重要的见解有：

（一）我国的古人没有把语言哲学理论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独立出来，而是溶于实践之中，中国古代语言哲学是一种“实践性哲学”，其理论也是一种“实践性理论”。这种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直影响着今天的语言学工作者。“实践性语言哲学”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不足。优势在于，不空谈理论，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一旦掌握了它的理论方法，就可以融会贯通；要学习到它的理论方法，要有“悟性”。不足，主要在理论方法的系统表述上。

（二）我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这段话里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哲学概念“道、生、和”。“道”是宇宙的本体，“生”是化生、变化的意思，“和”是和谐、平衡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整体、动态、平衡”，这是构成世界的三要素，他们辩证地联系着：动态平衡的整体，整体平衡的动态，整体动态的平衡。从“整体、动态、平衡”这一组辩证观念出发去认识汉语的特点。（参见《语言哲学对话》366~367页）

除了和哲学的混同，先秦语言理论产生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先秦时期，正是我国历史上的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活跃，学术空气浓郁，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社会氛围。汉代以后，语言理论的衰微也和缺乏这种氛围有关系。“在古代中国，理论思维、创造性思维被实用思维、自然思维所取代的‘头等重要变化的标志’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创造性思维已经完全失去了社会条件。”（转引自何著423页）所以，良好的社会条件，是决定语言研究和其他研究发展的重要条件，搞语言研究要充分认识和利用社会条件。

先秦时期虽然在语言理论上重大贡献，但总的来看，还处在萌芽时期。方言调查的实际成果如何，由于资料失传，无从评说。词义辨析和对古籍的注解也是个别的，还比较零散。修辞理论也不成体系。童蒙之学也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两汉语言学（公元前2世纪~公元3世纪初）

两汉时期的语言研究与经学密切相关。经学的发展推动了童蒙识字的发展，也推动了训诂学的发展。汉代是我国语言学创学科的重要时期，方言学、文字学、语源学都在这个时期产生。汉代也出现了扬雄、许慎、刘熙等伟大的语言学家，还出现了《方言》《说文解字》《释名》等重要的语言学著作。

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读经成为汉代博取功名富贵的重要途径

径。读经先得识字，因此，两汉王朝对编写识字课本格外重视。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都编写过识字课本，可惜只有《急就篇》流传到现在。汉代识字课本的性质跟后代的《千字文》差不多。

汉代崇尚经学，“训诂”由此兴起。东汉的马融和他的学生郑玄是著名的训诂学家，给很多古籍作了注。其他的一些学者如许慎等也为古书做过注。在汉代的古书注解中，词义的解释占有重要地位，《通俗文》和《小尔雅》是词义研究的比较重要的著作，可惜已经失传。

方言学的产生，和当时人们认识到方言分歧会引起交际隔阂有关，也和方言调查的传统有关。早在先秦时代，我国的先民已经看到了方言的存在以及方言对交际的影响。《孟子·滕文公下》有这样一段话：“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传诸？使楚人传诸？（假如有那么一位楚大夫，他希望他的儿子学齐国话，他给他找齐国人做老师呢，还是找楚国人做老师呢？）”可见齐方言和楚方言的差别是很大的。《左传》文公十三年叙述秦伯的军队驻扎在黄河西岸，魏人在东岸，魏寿馀对秦伯说：“秦伯师于河西，魏人在东。寿馀曰：‘请东人之能与夫二三有司言者，吾与之先。’”魏邑是晋国的属邑，据此可见，秦国与晋国之间，方言也是有差别的。《说文解字·序》说战国时代的七个国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那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汉代注重方言，也和皇帝的关心和提倡有关。刘歆给扬雄的信中说：“今圣朝留心典诂，发精于殊语，欲以验考四方之事，不劳戎马高车之使，坐知徭俗。”这说明，皇帝关心方言的调查，关心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了解社会情况。

扬雄顺势而为，写就《方言》。《方言》是汉语方言学的奠基之作，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悬诸日月不刊”的奇书。它采用调查的方法，以人民群众口头的活语言为研究对象，科学地分析了方言、俗语、古今语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并大体记录了汉代方言的地域分布概况。这样的语言学成就放到世界语言学史上去看，价值

也是很高的。《方言》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扬雄继承了周秦时期方言调查的传统，又有所创造。例如，调查的方法上，周朝采用的是派官员到各地搞实地调查。以扬雄个人的力量，他不可能搞实地调查，所以他利用孝廉和士兵等集中在首都的方便，通过向这些人采访收集方言来完成调查。又如，在对待古今语、方言和通语上，他以通语为释词，每一词条下列有方言，有的还解释古今语的不同。这实际上是一种纵横交错的方法。扬雄以后，历代还有不少人关心方言俗语，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只是可惜他们没有像扬雄那样以口头语言为研究对象；也没有像扬雄那样实事求是地搞一些调查。所以正如罗常培先生在《方言校笺·序》中所评论的，他们都“始终在文字里兜圈子，很少晓得从语言出发。能够了解并应用《方言》本书的条例、系统、观点方法的，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人。可惜从中国语言学史上发达最早的词汇学，从《方言》以后，就这样暗淡无光，不能使第一世纪左右已经有了逼近语言科学的方法继续发展。”（转引自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 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汉代的文字学主要是在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斗争的推动下产生的。自秦始皇焚书后，西汉时候，列于学官的都是用隶书写成的“今文经”，后来用鲁国文字写成的“古文经”被发现，但一直被今文经派排斥在学官之外，于是有了今文经派和古文经派的斗争。直到东汉时期古文经才盛行起来，并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表面上看起来，今古文经之争似乎是古文经派在为自己的学派争夺几个博士的位子，实际上这是两种不同学风的斗争。今文经派趋于保守，不肯承认有实际材料的古文经，同时他们自己对经书的解释又不很科学，烦琐和谬误之处很多。古文经派则比较注意从实际的语言材料出发，依据语言事实本身去解释意义。而且，古文经派的治学态度也比较科学严谨，后人说的“汉学”“朴学”“实事求是”之学，主要就是以古文经派为代表的。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汉学”的代表作之一。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从小通晓经书，当时人们称赞他说：“五经无双许叔重”。他“博采通人”“遵修旧文”写成了《说文解字》。《说文解字》以小篆为主体，分析字形结构，首创部首排序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释字源的著作。它也为研究古汉字、汉语词汇和古字音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说文解字》对后代语言学的影响非常大，后代的字典，基本上不出《说文解字》的范围，只不过是字数增加，例子增加罢了。许慎能写出影响如此深远的著作，正如何九盈先生所说：

许慎能够写成《说文》这样的名著，除了社会、历史条件之外，就他主观条件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有先进的学术观点和科学的治学方法。下面四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讲发展；二、讲系统；三、重材料；四、重证据。（何著 61 页）

就讲发展来说，许慎在《说文·序》的一开头就讲汉字的历史，其中谈到：“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在讲系统上，许慎紧紧抓住了“六书”。对于材料，许慎的原则是：“必遵循旧文，而不穿凿。”证据方面，他既“博采通人”“博问通人”，又注重古文经典和方言中的例证。除了这几点，许慎对语言文字本身也有比较科学的认识。他说：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传后，后人所以识古。（转引自何著 65 页）

后两句是对文字作用的科学论断。

汉代语源学的产生和声训在汉代的盛行有关。跟西方一样，我国上古时代的许多学者对语源发生了浓厚兴趣。语源学的原始意义是“真詮学”。西方古代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等都探讨过语词的真正意义，柏拉图还写了专著《对话集》。柏拉图与孟子同时。孟子也用过声训，但是说得不多，而且也不是为了语源学的目

的。到了汉代，人们才大量应用了声训，而且越来越明显地寻求“真诠”，即追究事物之所以得名的真正解释。今文学派的创始人董仲舒首先把声训关系提到了名实关系、天人关系的高度，提出了“名生于真”的观点，也就是认为事物的名称和事物本身存在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应该说这种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因董仲舒把名真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天的命名，又因为他的认识中有很强的政治性，他的合理认识就大打折扣，甚至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看法。在汉代的声训研究中，比较有成就的应当是刘熙的《释名》。《释名》是探究事物名称“所以之意”（即事物的名称）的著作，主要是对前代声训研究的总结，也有一定的开创性。虽然，后世的研究者一直认为它在释义等方面缺乏例证，有一些是出自作者的主观推测，科学性不强，但是客观上，它保存了一些东汉时的词汇，对了解东汉时候的语言文字情况和社会文化情况有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从语言学出发来研究声训的，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语源学著作，所以，《释名》被看作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语源学的奠基之作。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语源学的诞生。

《方言》《说文解字》《释名》三部著作各自代表了语言文字学的一个分支，它们又不无联系，它们都以词义研究为中心。以词义为中心是汉代语言学的主要特色。放到更广阔的范围说，重视意义也是中国古代语言学的重要特色。王宁说：

曾经有好几次，语言学界的朋友友好地问我：“陆宗达先生在传统语言学里最精通的是什么？”我按照自己的体会回答他们说：“中国传统的‘小学’是以研究意义为中心的。形和音（文字、音韵）都只是工具，意义是研究的出发点，又是研究的落脚点。陆先生精通的是意义之学，他是一个研究意义方面的专家。”我现在仍然这样看（《纪念我的老师陆宗达先生》，《训诂与训诂学》5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王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语言有意义和形式，两部分都很重要，要联系起来研究，人手可以是意义，也可以是形式。但是重要得多的还是意义。但是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中国语言学比较注意向外国学习的时候，却比较多地抛弃了意义。与此相关的一个认识是意义和形式的关系是任意的。事实上，意义和形式的关系没有那么多任意性，也不那么死板。从大的方面来说，人有听、看、闻、味、触等感觉系统，人类语言以听觉和视觉为系统就不是任意的，而且听觉系统更重要。人的发音和听觉器官又是有限的。许多先生说，汉语的语音有几个自己的特点，跟别的语言不同。某个意思可以这么说也可以那么说，这是不死板。即使可以有百千万个说法，从大的方面来说，把这百千万个说法加在一起来看，还是有原因的。还有一个说法是，一开始用某音称某物，搞不清，是任意的。万事万物都是个过程，这个“一开始”之前难道是空的？许多宏观得多的科学领域有许多新的探讨，我们对此不妨也琢磨琢磨。

三、魏晋南北朝语言学（公元3世纪～公元6世纪）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语言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此期间，语文学、修辞学有了新的发展，还出现了一门新学科——汉语音韵学。南北朝的音韵学是我国音韵学的第一个高峰。创造性的向外国学习是音韵学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语文学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批解释意义的辞书，比较有名的有魏国张揖的《广雅》，晋代吕忱的《字林》、梁代顾野王的《玉篇》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广雅》是《尔雅》系辞书，总结了秦汉至魏的词汇，反映了汉魏时期的语言面貌，弥补了《尔雅》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作用不次于《尔雅》。《字林》和《玉篇》基本上属于《说文》系辞书。

《字林》的贡献在于所收的字数比《说文》多了几千个，释义也与